

移民及其敌人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



学人文丛

王赓武 自选集

移民及其敌人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

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播

小帝国的辞令：宋代与其邻国的早期关系

永乐年间中国的海上世界

上海教育出版社

学人文丛

王赓武 自选集

王赓武 著

策划 许纪霖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赓武自选集 / 王赓武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6

(学人文丛)

ISBN 7-5320-7890-6

I. 王... II. 王... III. 华侨—历史—文集
IV. D634. 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40829号

学人文丛

王赓武自选集

王赓武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易文网: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4 字数 236,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50 本

ISBN 7-5320-7890-6/I·23 定价: 20.00 元

谨献此书给

父亲 王宓文(1904—1972)

母亲 丁 俨(1905—1993)

目 录

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播	1
中国之好古	1
中国文明与文化传播	23
中国社会中的学者:历史背景	41
早期中国与外部世界	61
小帝国的辞令:宋代与其邻国的早期关系	61
《旧五代史》及五代时期的历史撰写	83
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	104
永乐年间(一四〇二~一四二四)中国的海上世界	139
移民及其敌人	159
移民及其敌人	159
中国移民形态的若干历史分析	188
移民地位的提升:既不是华侨,也不是华人	206
东南亚华人	223
海外华人贡献以经济为首	223
华人、华侨与东南亚史	231
东南亚华人的身分认同之研究	238
东南亚华人与中国发展	267

民族主义与儒家	291
民族主义与儒家学说	291
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	303
主要著作目录	320

中国之好古

本文不拟谈关于过去各式各样的所有权问题,不考虑物质对象而集中于论述体现在文字作品中的思想和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权就不是排他性的占有,而是人们共同享有的一份遗产。它是大众可以选择过去以供今用的权利,涉及由谁决定将过去的什么思想保存下来的问题。与本书中论及其他一些民族不同,中国人还从未受到在文化上占优势的外国人的拓殖。他们的过去不是一部少数人的历史,而是一部多数人的历史。它是中国自己的过去,而且是一个两千多年来保持着强有力的统一的过去。虽然中国人认为他们的过去是优越

的,但他们只是为自己而说,从未宣称为人类而说。

让我从我自己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观察着手讨论。首先,我认为可以这么说,过去的大部分事情都是未知的,而且也不值得去了解。为过去而了解过去是毫无意义的,因此谋求拥有过去的一切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能够了解的是那些显著突出和为某种目的而如此呈现出来的部分。如果目的颇为高尚,那么它就可能使人们相信,如此选择出来的过去可以教诲我们。这种过去应该说是值得拥有的,因而也就被保存在经籍、历史著作和其他文献中。如果目的显然是把持操纵性的,那么那些利用过去的人就会用以控制人民,因而是利用过去来控制现在。不过,这只能是暂时的,如果不能有以海人,也就不会持久。

其次,中国人对近代史与古代史有不同的看法。近代史千头万绪,过于散乱和专门化,而且大多数又有高度技术性。它通常被政府掌握,或置于国家控制的档案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获得这些材料。在官员和学者们看来,近代史对于现实政治和有效的政府是必需的而且是有价值的,但对于文明教育和道德教育则毫无用处。另一方面,古代史仅残存在有限的经典著作中,并且一向被选作诲人之用。由于文献有限,几乎所有识字的人都可以了解它,掌握它,甚至还可自称它为己所有。这些文献经历了许多世纪的考验,并被认为是永垂不朽的。因此,它们事实上就提供了一些原则,以决定如何对待近代史的原则。况且,古代史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你可以安全地浸沉于其中,躲避于其中,从中汲取崇高的教益,而每个人都可以在对古代史有共同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交谈。明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很自然地认为,古代史比现代史更值得了解,更有吸引力,甚至更可爱。

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比中国人更明显地关心其过去的民

族。但是，中国人从未问过“是谁主宰过去”这个问题。他们看不出有这种需要。在某个层次上，他们会说掌握过去的是他们的祖先。但在另一个层次上，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读过全部古代经籍和著述全部历史的儒家学者，其次或许是自视为古代一切的保护者并且利用往事来使自己具有合法地位的皇帝及其朝廷。总之，人们有理由作这样的假设：长期以来不断影响着中国人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必定是属于中国人的。其程度如何，取决于人们想要知道什么以及中国人是否认为从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我不想在此将这个众多方面都加以考虑，对于那些有关祖先如何拥有过去这些更深奥、更微妙和更有趣的争论问题，尤其如此。相反，我只是集中论述儒家学者及其涉及皇权的问题，让我以孔子《论语》中的两段话开始——本文的标题“好古”的出典即在于此。第一段话是：“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第二段话是：“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1]这两段话中谈到四点：好古、信古、述而不作与求知于古。这四点在汉代以后中国人对自己深刻意识到古代这一点上产生过作用。那种往事是极其重要的知识。追溯往事和获得对往事的了解似乎最接近于掌握过去。至少，这似乎是“好古”能在中国历史上产生强有力影响的根本思想。

这是一个大题目，想把它的大部分内容都包括在本文之内是愚蠢的。本文只想从中国历史上两个关键性时期的背景下研究“好古”一词，看看有些中国人在危急时刻是如何运用或对它作出反应的。第一个有关时期是公元九六〇年（北宋）以后危急的一百年。第二个有关时期是我们这个世纪，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在这两个时期里，中国人的“古代”，指的是中国统一之前，亦即公元前二世纪之前。对孔子及其

同时代人来说,当然还要早,不仅仅是指商代和西周,还包括传说中三皇五帝统治的年代。但对本文论述的两个时期来说,“古代”包括孔子的时代直至秦朝在公元前二二二年统一中国前不久的战国末年。同样还需要指出的是,其他哲学家并不像孔子那样也具有好古思想。战国时代大多数论及“古代”的哲学家,仅仅承认了解古代是有用的,却又经常强调这种了解不足以解决眼前问题。许多人热衷于改变过去,而不是好古(见罗根泽《晚周诸子返古考》)。一种普遍的想法很简单:欲知现在,必明过去。诸如庄子和荀子等这些哲学家对那些一味谈论古代的人感到不满。“崇古非今”是庄子所批评的时尚(见沃森《庄子全集》),而荀子则对那些“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见北京大学《荀子新注·儒效》)的学者更加鄙视。但老子却说:“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见刘殿爵《道德经》)。

在儒学成为统治学派的两汉时期(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三世纪)以后,“好古”已与“好学”等同。^[2]“古”变得如此重要,致使人们普遍认为,凡事欲求成功,研究古代至关重要,甚至人们在报效帝国政府之前就必须研究古代。好古与好学往往都要在《尚书》中引经据典(见理雅各《中国七经》)。确实,到了东汉,研究古代是通向财富、地位和权势之路,正如在《后汉书》卷三七桓荣所说的一段臭名昭著的话所概括的那样:“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当然,怀疑派总是存在的,他们在公元一世纪的争论中的论点见于桓宽的《盐铁论》,其中“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世务”一语是其论点的最好概括。但在汉代儒学占统治地位时,这些怀疑就消失了。研究古代直到汉末已经变得太有用了。

汉朝覆亡,内战接踵而至,各种外族部落征服中国北部,从而把上述一切都改变了。在三世纪后的七百多年中,“好

古”黯然失色,成为少数人的信念,对国家和社会几无影响。虽然承认古代延续性的历史学家不乏其人,但他们主要都专心致志于记载近事的专门问题。^[3]其间有些例外,特别是在唐代(六一八~九〇六),但我将一笔带过,以论述本文涉及的两个关键性时期中的第一时期。然而,我确实要提到,在紧随八世纪中叶安禄山之乱而发生破坏性的内战以后,对古代的兴趣有所恢复。在一片混乱和摇摇欲坠的恢复之中,少数几个人,其中著名的有韩愈,摈弃佛教而以新的眼光重读儒家典籍(见普利布兰克《唐代知识生活中的新儒家与新法家〔七五五~八〇五〕》)。韩愈及其追随者在九世纪对当时作品中的骈文词藻尤加抵制,他们追求古代的朴实、明了和坦率的风格。最重要的是人们正日益反对那些似乎已丧失道德指导意义、僵硬贫乏的正统观念。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古代的时机似已成熟,然而要人们重新热爱过去尚需一段漫长的时间。

唐朝在九世纪末崩溃,这个老帝国分裂了将近一百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的贵族集团被摧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内战产生了一批截然不同的上层分子。到十世纪中叶,有几个活跃的学者正在为恢复唐朝的制度而奋斗,他们作出努力去刻印经籍、搜集档案史料,并重修新史。但这不是一个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时代,更需要的是军事、管理和财政方面的技能,这是稍有一点知识就可应付的。虽然如此,还是有极少数人为了维护唐朝的礼仪、法律和行政制度而以某种方式钻研经籍,通过科举考试并担任高官显职。宋朝的第二和第三代皇帝在位期间(十世纪末),皇帝鼓励科举考试采用更高的标准,任用高级官员担任学术工作,包括编纂几部类书,其中保存着大量较早时期的著作原文,这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国家以某些显而易见的方式拥有过去(见柯睿格《中国宋初的文官》)。

然而,这种工作大部分是搜集文人遗稿和残存的文献。它们是有用的,但其本身对一些要求对中国文明有更深理解的学者来说几乎并没有什么帮助。一直要到三四十年后学者们开始对体现在这些类书中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时,它们的作用才显现出来。于是,一股活力骤然迸发。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出生的那一代人对重要的经籍重新作了解释,为日后控制中国将近九百年的理学奠定了基础。至于论战是如何进行的,学术如何在政治领域泛滥并造成凶猛的清洗,以及朱熹又是如何集其大成等等,这些事已是老生常谈,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将提出的是,在新的观念尚未能够就种族特性、善的起源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等问题产生新见识之前,有一种关键性的思路却使学者们有可能做到。这种思路正在使中国人追溯到古代并以爱好的心情进行研究。这种对古代的重新强调,在欧阳修(一〇〇七~一〇七二)的著述中登峰造极,特别是他对重修唐史和五代史所作出的贡献(见刘子健《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

这种复古的关键在于历史著作之中,即要到《左氏春秋》以及受其激励而去仿效和研究的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去找。^[4]

九世纪初,刘蕡(享盛名于八二〇~八三五)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是个很好例子。这篇文章是在韩愈为打击源出外国而在新近传来的佛教而作出恢复古代传统的著名呼吁之后的几年里写出来的,这决非偶然之事。刘蕡对宦官控制的唐朝朝廷作了详细的批评,时在八二八年。这篇文章成为一份引人注目的抗议文献,因此成书于九四五年的《旧唐书》卷一九〇与经过全面修改和充实而成书于一〇五八年的《新唐书》卷一七八都将全文收录。《新唐书》由欧阳修与其同僚编纂修订本,主要是因为对于运用历史已经出现一种新的观点。但是

尽管有“修正”，刘蕡的评论在《新唐书》中仍很突出，特别显著的是他在十一处具体运用《春秋》来提出他的政治论点。此文很长，不能在此引录，且其意义也不那么深刻，其中的儒家思想是因袭传统的，而提倡向古代圣王学习则是显而易见的。我不去探究刘蕡如何批评唐朝朝廷，而是举其中两个例子来说明《春秋》是如何被孔子用来表示褒贬的。据记载，僖公十九年，“梁（国）亡”，但不提秦国把它征服一事。这被认为是用孔子的方式，说梁是自取灭亡，因为其王不愿倾听善良的规劝，致使人民把他抛弃。只用简单的一个“亡”字，孔子表达了他是如何对梁表示不满的（见《旧唐书》卷一九〇、《新唐书》卷一七八、理雅各《中国古籍》卷五）。另一个例子是，孔子曾在僖公在位期间，六个月内三次提到“无雨”，以示统治者关心人民，因而没有出现灾害。可是，在文公当政时，孔子在三年中只提到过一次“无雨”，表明他认为统治者不关心人民，因而使干旱造成灾害（见《旧唐书》、《新唐书》和理雅各《中国古籍》卷五）。人们必须熟读《春秋》，才能理解刘蕡运用这种例子的含意。

这十一处具体引用《春秋》的重要意义在于刘蕡的文章在九世纪博得人们赞誉，在十世纪编修《旧唐书》时又受到称赞，而且在十一世纪以《新唐书》取代《旧唐书》时仍然受到称颂，它在二百余年间被广泛传诵。这是“好古”如何在旧秩序崩溃而人们不得不重新探索新秩序的黑暗年代里坚持下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孔子为古代中国的分裂和混乱的另一个黑暗年代提供了一种新秩序的体制。九世纪和十世纪（晚唐、五代和宋初）的学者因此就能有所慰藉和树立信心，这样也就支持了那些可以用于建立新秩序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的信念。

我不想夸大这些学者的作用。新秩序是必须用军事胜利来建立的。学者则从事研究和教导，为胜利者效力。在一个

胜利者集团不能在足够长的时间内掌握权力之前,新秩序是无法维持的。学者的工作是辅助胜利者恢复帝国制度。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所做的工作只是要使唐朝的制度重新出现,但那些好古者却更进了一步。他们想要恢复古代的美德,以便按最高准则来建立新秩序。在这方面,《春秋》是理想的,因为它既不抽象和具有哲学意味,也不拘泥于礼节和制度,而是强调具体的历史范例。由于这些范例来自古代,所以它们甚至更有用,因为它们没有多少缙文细节,并被认为是好古的孔子作过道德和政治评判。^[5]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儒学在十一世纪初的大规模复兴,一方面是以一本占卜书《易经》,另一方面是以一本古代史《春秋》开始的。在这两本书中,后者在最初几十年中作用更为显著。理学运动的三个先驱者都运用《春秋》,其中两人,孙复(九九二~一〇五七)及其弟子石介(一〇〇五~一〇六三)成为讲授《春秋》的著名教师,还留下一些评注,说明《春秋》切合他们的时代(见黄宗羲《宋儒学案》和《宋史》卷四三二。第三位是胡瑗[九九三~一〇五九])。他们两人都用《春秋》来强调中国文明的古代准则及其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并且论证为什么必须将“蛮夷”拒于中国之外,又为什么应该抛弃诸如佛教那样的“蛮夷”宗教。当然,佛教并未被抛弃,但求助于古代为当世找到具体教训的整个气氛却达到了一个高度。

不久以后,与石介同时代的欧阳修就以《春秋》为借鉴,寻找撰写历史 and 评判较近史事是非曲直的新途径。他在修订《新唐书》中所起的作用和他本人重写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都是他好古的例子。欧阳修深信,仿效孔子对春秋时期所作圣贤直言简意赅的评判,他也正在从近事来汲取深刻的教训,对他来说就是从唐朝和五代发生的事来汲取教训。古事不仅有助于理顺晚近发生的事以供今用,它还是基本的而

且是充满在各方面的文明的体现。如果要恢复最高准则的政府,使中国再度稳定和使人民再感到满意,效法古代是必不可少的。欧阳修在研究古代方面强调其非实用主义的态度,他建立了广泛研究和搜集古文物的金石学。尽管这门科学并未导致考古学的兴起,却对系统考察古文物大有裨益。这种研究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在他自己的大纲《集古录》中臻于顶峰,此书在宋代几种重要的金石学集刊中是第一部(见刘子健《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和王赓武《近代中国的前近代史写作》)。这是他好古的具体表现,但给他印象更深的是一些同样可以感触到的事,即孔子纂修鲁国编年史,以便使历史评论能为未来确立政治和道德标准的一种传统。欧阳修赞美孔子判定犯有谋杀或篡位之罪,或者组织政变反对其前任的那些统治者孰是孰非的方法。他同样也钦佩孔子对那些蒙冤受屈或罪有应得的大臣、官吏和臣民究竟谁忠谁不忠的断定。他追随孔子,相信确切地断定一个人是如何死的,并用正确的用语指明围绕其死亡情况而发生的道德争议是极其重要的。在谈到处在统治地位的家族时,其家族内部,即在父子之间和兄弟之间的相互背叛问题特别重要。这一点可以从《新五代史》头十二卷由徐无党(但也许是欧阳修本人)所写的评语中看出(见刘子健《欧阳修:十一世纪的理学家》)。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对正当礼仪和施用刑罚所持的态度,前者决定一个王朝或一种统治的合法性,后者则表达了专横和残酷(见《新五代史》卷一~一二评语,姚瀛艇《论〈新五代史〉的人物评价》)。

这样,欧阳修的历史评论就是他好古的最好例子。他非常谨慎小心地作出这种评论,往往只用一两个字以示褒贬,但他还撰写了长篇评论。最近,我曾将他在《新五代史》中所写的五十八篇这种评论译成英文(尚未发表);试举其中卷二一例,就足以表达这些评论的风格:

呜呼，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予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法也。”“然则春秋亦褒篡乎？”曰：“惟不绝四者之为君，于此见春秋之意也。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

我确实还可以举出其他许多例子来说明欧阳修自觉地信奉一种古代的职责，即历史学家所起的道德和政治作用是要用古代去阐明秩序和权威的原则，特别是统治者权威的原则。他的评论与百年前的历史学家们因袭传统的评论之间的不同之处，鲜明地显示出：“好古”已使他这一代人与十世纪的虚伪空洞的陈词滥调背道而驰。

当然，好古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也承认往事对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所具有的生命力。事实上，欧阳修所代表的只是交织成这种显著的十一世纪“文艺复兴”的复古思路之一。哲学家们不久就大大超出古代，建立起儒学的新基础。这一过程，亦即理学的发展过程，内容丰富多彩，已不属本文论述范围。然而，政治家们的思路却非常有趣，我打算在谈第二个时期，即在谈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百年时去论述。这条思路是借古颂今为激进的改革辩护。显然古史在十一世纪曾被人用于最有戏剧性的方式之一。

这段历史也是人所熟知的。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是欧阳修的同乡，一度是他的门生。此人在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以最伟大的激进改革家而享有盛名。人们对他的学术

背景和他从欧阳修那里汲取的好古精神却不甚重视。但他采取的方针与其老师不同。他不是着眼于《春秋》，而是求助于《周礼》。此书反映孔子去世后战国时期的理想主义，对于在中国激起乌托邦式的希望颇有影响（见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策》）。姑让我简单地说，“好古”并不是仅仅导致像人们想像的保守主义。重温古代的经籍、榜样和模式，一方面引起了对于孔子的价值观念的最彻底的争论和重述，另一方面也导致一场一千多年来最激进的改革尝试。在此后的八百年中，激进的措施就不曾再出现过。

现在让我来谈我所说的第二个时期，即过去的一百年。这一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始于王安石停止不前的地方。我指的是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在十九世纪末提倡的激进改革。这两个时期在表面上还有其他相似之处。清代中国处于严峻的外国压力之下，正如北宋受到北方契丹王国和西北部党项王国的威胁一样。当然，继灾难深重的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改革的需要更为迫切。一八八五年后，中国先败于法国，后又败于日本，犹如十一世纪时不得不向北方蛮夷辽国和西夏进贡一样蒙耻受辱。然而，或许更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差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如何看待古代方面的不同。首先，好古在中国早已恢复，并且早已是正统观念了，十八世纪卓越的古典学术成就尤为显著。因此康有为并不代表复古运动的顶点。相反，他倒是怀疑长期以来对古代的阐释是否能救中国的最早一代人。其次，外国的学问又与中国过去的经验大小相同。韩愈、孙复和石介提倡的“好古”所形成的抵制外国的传统是不适用的。与之相反，康有为这一代人恰恰又是最早注意西方并认识到，由于古代在中国之外已经产生了伟大的宗教以及某些不朽的政治和道德哲学，因而现在观察古代，要更多地注意不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事。